

## 论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与贡献

□谢迪斌

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民主革命，开辟武装斗争道路的重要行动之一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。杨殷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，也是中共广东组织（广东区委）的核心成员。杨殷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，在起义的准备、发动、推进及善后工作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虽然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了，但杨殷在起义中的重要贡献，仍然彪炳千古，光照后人。回顾和讨论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与贡献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现实教育意义。

### 一、领导广东党组织为起义准备了条件，营造了氛围

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地区，在民主革命中，承担了基地和前沿的重要作用，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，广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。这一中心的形成，主要是国共两党精诚合作、两党中央合力经营的结果。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发展，与广东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和有效行动是分不开的。从广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开始，广东党组织就能够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斗争实际相结合，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广东革命形势，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中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运用正确的策略，不仅赢得了自身力量的迅速发展，而且较好地控制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局面，掌握了革命主动权，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、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20世纪20年代，杨殷在广东区委中的地位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，在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集团中也得到了认可，从一个一般的区委干部上升到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，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。这在于他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杰出的领导才能，特别是在军事决策和指挥能力上有卓越的表现。他的政治素质与军事才能，对广东区委的工作特别是军事建设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他所提出的一些军事观点和方案，不仅表现出他独特的眼光，而且在当时有着超凡的影响。在国共合作期间，中共党内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，不注重武装斗争，尤其是在争取武装斗争领导权问题上，有着严重右倾观念，不注重自身武装建设，放弃武装力量的领导权。这种思想倾向和行动选择也贯彻到了广东区委，但是，处于斗争第一线，面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广东区委，对问题的看法和解决方案，必然要联系实际，所以，广东区委特别是杨殷等人，并没有按照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来制定政策和实施行动，而是根据实际需要，进行了一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强硬行动，对一些破坏统一战线，打压共产党的反动势力的言论与行动，予以回击。如在官僚买办集团叛乱时，广东区委采取了措施和行动。杨殷是广东区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，在国共两党高层对官僚财团有所顾忌、患得患失的氛围下，广东区委主张坚决进行打击，以强有力的军事手段对商团的叛乱进行平息。在平定商团叛乱的过程中，杨殷的领导能力与军事才华得到充分的体现。平定商团叛乱，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，维持第一次国共合作，都有重要意义。杨殷还是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在省港大罢工行动中联系和集聚起来的武装力量，成为广东区委后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基础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广州起义奠定了基础。

孙中山逝世后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倾势力不断膨胀，在夺取统一战线领导权、排斥和打压共产党力量方面，实施了一系列行动，如三二〇事件、“整理党务案”。由于各种原因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采取回击。广东区委在这一问题上有自身的看法，主张采取果断的行动，回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进攻；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言论，谴责国民党右倾势力的叛变和分裂行为。杨殷领导军事部和肃反部更是做好了军事回击的准备。

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，广东区委主要领导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中央决定由穆青、杨殷、赖玉润等人组织临时广东区委领导机构，杨殷成为广东党组织

的主要领导，他参与革命关键时期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，采取了有效行动，保存和掌握了一定的革命势力，为后来广州起义的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杨殷一直以来都坚持用革命武装来回击反革命势力的镇压行动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，杨殷领导的广东区委曾经提出动用工人武装，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行为进行回击的主张，但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，广东区委不能采取行动。八七会议后，中央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。会议精神与广东区委和杨殷的主张完全一致，所以，杨殷十分积极地加快对广东地区武装力量的建设，紧张筹备武装反抗的行动。他作为新成立的南方局军事负责人，在各地宣传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精神，组织力量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。他强调：“这一回的教训是拿血写下的，再不要空谈革命，要拿起武器来。”他主持召开会议，制定了在海南发动秋收起义的方案。在八七会议后，如果按照杨殷等广东区委的主张，迅速在广东地区举行起义的话，那么与南昌起义、湖南秋收起义在时间上的策应就会更为积极，起义的成效要比年底再来发动要大得多。但由于当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对广东地区的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，对广东地区武装斗争缺乏信心。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遭到失败后，中央决定停止在广东进行武装起义的计划：“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，暂时已经不可能”，“广州暴动的计划应立即停止。”

杨殷及广东区委其他领导在行动上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，在思想上并不认为广东武装起义的机会已经失去，根据广东地区的革命形势和自身所掌握的革命力量，认为还是可以积极争取形势的有利一面。杨殷与张太雷等南方局领导认为，南昌起义的失败“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，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”，工农运动的高涨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，实际上更形高涨”。因此，在广东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“应继续实现”，“不应停止”，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。杨殷作为军事方面的负责人，在这一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中央对广东的形势判断又有新变化，决定发动广州起义。但此时已经接近年底，南京政权已趋稳定，广东革命形势在进一步恶化，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。

## **二、在起义过程中发挥了核心和中坚作用**

1927年11月中旬，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广东形势进行了分析，认为目前广东面临一个对反动政权进行进攻的好机会。11月17日，中央常委通过了《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》，命令广东省委“急速”发动全省总暴动，“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”，并规定暴动的中心是夺取广州政权。按照中央的要求，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积极投入到广州起义的紧张准备工作中，作为南方局的3位重要领导之一、军事和肃反两个重要方面工作的负责人，杨殷主持和参与了广州起义准备的全过程和重大决策，为广州起义的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杨殷在广州起义过程中的中坚与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：

### **第一，是起义军事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和计划实施的主要动员者。**

1927年11月17日，中央关于举行广州起义的命令下达给广东省委之后，广东省委立即行动起来，从各个方面准备起义行动。11月26日，张太雷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会议，传达和贯彻中央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指示精神。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，杨殷负责总指挥部的军事参谋团，领导收集各方面情报，制订军事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。

军事计划制定后，杨殷同广东省委其他领导深入基层，进行计划与方案的部署，对基层干部进行动员，增强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，指导计划实施的具体细节和重要行动。12月7日，张太雷、杨殷、周文雍等领导同志召开并参加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，作了起义的动员和部署。后来由于敌人对起义行动已有所察觉，遂决定提前于12月11日举行起义。杨殷即派人通知各处提前行动。12月10日上午，杨殷赶到黄沙秘密联络处召开了西路起义军领导骨干紧急会议，传达了提前起义的决定和部署。当天，杨殷又在禺山市场杂货铺与叶挺召开参谋团会议。杨殷在会上报告了掌握的敌情，叶挺具体部署了起义的行动计划。随后，杨殷

又和周文雍到谭新街联络处召开了西路起义军的行动会议，明确了各战斗单位的任务、方法和互相配合等问题，抽调铁路工人中的一部分骨干组成敢死队，配合教导团攻打市中心的公安局，指示铁路工人赤卫队在打下黄沙、石围塘后，接应郊区农民赤卫队进城，控制铁路和广州外围。会上，杨殷还强调起义后要立即肃清反革命，防止敌人破坏。

## **第二，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集聚者和组织者。**

广州起义之时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过去 8 个月，国民党右派对广东地区的革命力量进行长时间的镇压，大部分革命力量特别是工农武装已经解散和流失，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分散在各个地区。为了举行广州起义，就必须将这些革命力量重新集聚并组织发动起来，形成起义的基本军事力量。这一工作主要由长期担任广东地区党的军事领导人的杨殷来完成。

重新组织工人赤卫队。在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，广东工人发挥过重要作用，发展成为广东地区的重要准军事力量，参与到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之中，但四一二政变后，这支力量受到了镇压。杨殷首先寻找失散在各地的工人武装力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，由他们将原来的成员集中起来，为起义作好力量准备。杨殷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取得联系，并安排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护送到广州。如铁路工人骨干李甫、李连在四一五政变后隐蔽在家乡中山县，这时，杨殷通知他们迅速回省，组织工人赤卫队；李连后来在广州起义时的黄沙火车站战斗中英勇牺牲。曾伟赞是肃反委员会的联络员，根据杨殷指示，他把被反动政府驱逐而失业流散在广州街头的铁路、印务、理发工人串联起来，在黄沙将军庙后街建立了秘密活动机关，联络工人，准备武器，积极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。

重新组织农民赤卫队。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曾经有很大的规模，是全国农运的中心，有一支力量较强的农民武装。同工人武装力量一样，它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受到镇压，从而瓦解失散。为了将这支力量组织起来，为广州起义做好准备，杨殷做了大量工作。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到广州郊县去寻找原来的一些农民运动领袖，通过他们将曾经的农民赤卫队重新组织起来；还派遣梁复燃（然）等人从香港回到南海，把被打散而隐蔽在各地的农民武装统一组织起来。这支农民赤卫队在广州起义中配合工人赤卫队打下了广三车站，接运农民武装进入市内参加战斗。

## **第三，起义过程的主要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。**

经过包括杨殷在内的广东省委的紧急准备，同时由于有关情报的泄漏，广州起义提前于 1927 年 12 月 11 日发动。在整个起义过程中，杨殷都是重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，特别是担任军事方面的组织与协调工作。12 月 12 日，起义主要领导人、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太雷遭到反动武装的伏击而牺牲，杨殷接替其领导工作，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，成为广州起义后半期的主要领导人，在广州起义的后期组织与推进中发挥了主要作用。在起义爆发后，他指挥了起义的主要战斗——攻打广州公安局。由于其有效的组织，战斗取得了胜利，珠江以北的市区敌人被驱赶出去。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，防止外围敌人组织力量反扑，杨殷在攻打广州公安局取得胜利后，迅速组织力量到郊区控制铁路，用火车将附近的农民武装力量运送进来。同时又通过铁路车站的控制，阻止敌人的兵力和物资运送，切断市区敌人的后勤补给。杨殷的这些军事行动，对于起义的推进，特别是迟滞敌人的进攻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如他组织力量对黄沙、石围塘火车站的控制，就使得西部的敌人无法通过火车进入，也不能进行物资与军火的输送。据记载，张发奎“调各江军队返省讨共，但广三、广九、粤汉三路，均为共党占据，火车不通，运兵颇不便。”

## **三、积极组织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**

广州起义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杨殷及广东省委提议的八七会议之后、1927 年 10 月之前，但中央和共产国际判断失误，贻误战机，后又误判形势，匆忙下令广东省委发动起义，这注定了起义是一场极其困难的行动。起义爆发后，受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，在革命形势总体

处于低潮的背景下，广州起义很快就难以在城市坚持下去，最终失败。杨殷作为起义后期的主要领导人，尽最大努力进行起义失败后的后续工作，为降低起义失败造成的损失、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### **第一，坚持战斗到最后并组织力量向农村撤退的主张。**

1927年12月13日之后，反动势力从各个方面向起义的中心区域逼近，共产国际代表在这种情况下，才决定起义军撤出广州。杨殷本来早就同意叶挺等人将起义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农村，利用当地农民运动的历史基础，保存革命力量的主张，但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，他只好率武装力量继续在市区进行战斗。他率领一支工人赤卫队一直战斗到最后，只剩下几十人时才撤出广州。1928年1月，杨殷受广东省委委派赶赴海陆丰，与撤退的起义部队会合，与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，扩大了东江的苏维埃运动和武装斗争，使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精神得到保存和延续。

### **第二，积极组织 and 解决起义人员的安全和生活问题。**

起义失败后，大量的起义人员和烈士家属与组织失散，并遭到反动势力的追捕，生命受到威胁，生活面临严重困难。杨殷利用其长期在粤港澳生活、工作的关系和资源，努力筹集经费，帮助起义失散人员及烈士家属。敌人在攻占广州起义指挥部后，即进行疯狂屠杀，造成大量伤亡。为安置烈士家属，杨殷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为筹集资金帮助广州起义的失散人员和烈士家属，他多次变卖家产，甚至将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。杨殷为起义失散人员和烈士家属继续保持革命的信心，重新投入革命事业打下了物质与思想基础。

### **第三，积极反思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。**

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共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三大起义的最后一次，也是失败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，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。杨殷在起义失败后，忍辱负重，为了党内团结，接受了广东省委的处分（后被中央发现后撤销）。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功过是非，而是从革命的总体来分析失败的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。1928年12月，广州起义一周年之际，杨殷写下《斗争中的回忆》一文，回顾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，以“追悼既往，策励将来”。他号召，为了纪念广州起义的烈士们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，直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，这是对广州起义最好的纪念。“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，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，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！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我们的政权。”

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优秀表现与突出贡献，最终为中共中央确认和肯定，被委以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的重任。1929年，杨殷因被叛徒出卖被捕，英勇牺牲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《以群众的革命的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》的文告，对杨殷在广州起义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进行了充分肯定：“杨殷同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之广东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，是广东铁路工人的领袖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。他曾亲身参加广州暴动，为人民委员会委员之一，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，并曾亲身指挥赤卫队与顽强的敌人作战，直战至暴动的第三天，尽了最后的努力。”

（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）